

夏咸淳 著

明末奇才——张岱论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

明末奇才——张岱论



——张岱论

夏咸淳著

责任编辑 陈如江

封面设计 邹越非

明末奇才——张岱论

夏咸淳 著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

（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）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崇明红卫印刷厂印装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7.125 字数 150,000

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,300

ISBN 7—80515—139—3/1·15

定价 2.40元

目 录

小 引	1
第一章 一块遗落的补天石	4
一 累世显宦	4
二 补天美梦	8
三 发愤著书	13
四 天崩地裂	18
五 婆婆一老	22
六 著作等身	26
第二章 新潮与传统的融汇	30
一 开樊撤禁，物性自遂	30
——启蒙思想的闪光	
二 忍霜耐雪，仔肩宇宙	46
——儒家文化的发扬	
三 能动能变，风雷为益	64
——朴素的辩证思想	
四 学问最怕拘板	83
——灵活的治学方法	
第三章 丰富的美学思想	98
一 柳麻子的丰采	98
——论美与丑	

二	西湖的性情与风味	102
	——论自然美	
三	清、刚、智三品	107
	——论人格美	
四	一技一艺皆有至理	112
	——论艺术诸矛盾关系	
五	“非经折挫，宝色不酣”	130
	——论艺术家	
第四章	散文艺术的奇葩	142
一	刻画入髓 毛发都动	142
	——人物小品	
二	奇情状采 引人入胜	150
	——风俗小品	
三	空灵晶映 笔具化工	159
	——山水小品	
四	小能统大 姿媚跃出	167
	——短隼之美	
五	句法字法 与人各别	176
	——语言之美	
第五章	金声玉振传千秋	185
一	岷然有一张子	185
	——诗歌艺术	
二	声调自成一家	194
	——词曲艺术	
三	“文中乌获 后来斗杓”	202
	——历史地位	

小 引

十六世纪，当欧洲闪现出文艺复兴的灿烂光辉，由中世纪跨入近代文明大门的时候，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母体内也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，现露出近代社会的曦微曙光。由于封建生产关系的强大稳固，明朝后期统治的腐败，又由于尔后满清少数民族政权取代了明朝统治，强化了封建专制主义和陈腐的传统观念，刚刚出土不久的资本主义幼芽受到了遏制，而不能象在欧洲大陆那样茁壮生长，从此，中国和西方的距离越拉越大了。

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光辉灿烂的文化，大批多才多艺和学问渊博的巨人，乃是人类的骄傲。十六、十七世纪的中国也出现过群星灿烂、人才辈出的文化景观。当时思想文化的精英们，尽管遭到封建制度的压抑和摧残，仍然创造出巨大的业绩，不论是在自然科学领域，还是在人文科学领域，抑或是在文学艺术的园地，都有超越前代的卓著建树。李时珍、徐光启、徐弘祖、宋应星、李贽、王夫之、黄宗羲、顾炎武、方以智、朱载堉、兰陵笑笑生、汤显祖、袁宏道、冯梦龙、张岱、叶燮、石涛、八大山人……，这一颗颗明星将中华文明点缀得格外绚丽夺目。那时中国也有自己的达·芬奇、米开朗琪罗、拉斐尔、莎士比亚、塞万提斯。已故明史专家谢国桢先生对明末清初的文化曾给予很高的评价，他指出：“明末

清初，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大动荡时期。它也和春秋战国、魏晋南北朝一样，在学术思想、社会经济和风俗文化上有自己的特点。”（《增订晚明史籍考前言》）又指出，这一时期的文化“异常灿烂”，“在我国学术文化史上起着划时代作用”（《方以智年谱序》）。这是根据大量的史料，经过长期的研究，得出的符合实际的结论。明清之际文化在人文主义和经世致用思想两大潮流的交汇激荡中，放射出灿烂的异彩，对中国近现代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本书所要论述的主人公张岱，就是在明清这个大动荡时期，在启蒙思想和致用思想两大潮流的交汇中，出现的一颗文学明星，一位有“大抱负”、“大经济”、“大学问”的人物。他出身在绍兴一个官宦世家和书香门第，过着优裕的生活，受过良好的教育，但是怀才不遇，有志莫伸，始终是一个布衣之士。五十岁那年，清兵占领绍兴，国破家亡，张岱坚守气节，甘居清贫，发愤著书，最后穷困以终。是历史大转折的时代，是新的社会思潮和优秀的传统文化，也是个人大起大落的特殊遭遇，造就了这样一位了不起的人物。张岱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作家。他的散文绝妙古今。他还精通诗词、戏曲、书画、篆刻、音乐、园林，以及各种民间艺术。他具有很高的鉴赏能力，在其著作中包含丰富的美学思想。张岱又是一个杰出的历史学家，所作纪传体明史巨著《石匱书》，卷帙浩繁，时人誉为明之《史记》，单凭这一点，即可跻身于同时代巨儒硕师的行列。他的学问非常渊博，不仅通晓经学、史学、天文、地理、小学、音韵，而且对礼乐、刑政、兵戎、财赋、盐法、漕运等等，也很有研究。在他的著作里，充满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，闪耀着智慧的火花。

但是，在明季动乱黑暗的时代，张岱和其他一些文化之星，都受到压抑，饱经忧患，他们的生平遭际似乎不如西欧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们那样幸运、走时。他们中的许多人，在世时，命途多舛，不为权势者所重，歿世以后，在世人心目中也很淡薄。他们就象埋在层沙积石之间的闪闪黄金，又象隐在浓云密雾之中的晶晶明星。从明末以至清亡的三百年间，张岱的名字和著作鲜为世人所知。他一生撰写了不下四十余种著作，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仅注录《西湖梦寻》一种。这是历史的悲剧。

由于张岱是一位博大精深的作家，明清之际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时期。而笔者不揣简陋，企图通过此书对张岱作比较全面的论述，使今天的读者略睹其人概貌，并有裨于文史研究。这又谈何容易，真是吃力不讨好的事，难免要产生纰漏错误。但是笔者为主人公那种特殊性格，为其留下的丰富而光采的文学遗产和其他精神财富所深深吸引，而欲罢不能，总算硬着头皮写完此书，实惶实恐。亟盼学术界在这方面能有精深的研究著作问世——不但有张岱的，而且还有明清之际其他文学家的。晚明文学，清初文学，还有大片的处女地，还有许多珍贵的宝藏，等待着人们去开垦、发掘。

第一章 一块遗落的补天石

一 累世显宦

张岱，一名维城^①，字宗子，又字石公，号陶庵，又号蝶庵、天孙、六休居士^②。浙江山阴(今绍兴)人。生于明万历二十五年(1597)，卒于清康熙二十八年(1689)，享年九十三岁^③。

张岱祖籍原属四川绵竹，故岱每自称“蜀人”、“古剑老人”(绵竹古属剑州)。远祖张浚，字德远，宋代抗金名将，后为宰相，封魏国公。浚六世孙远猷于南宋末年任绍兴太守，世世家焉^④。远猷十一世孙张天复，字复亨，号内山，又号初阳，晚号镜波钓叟。嘉靖二十六年(1547)进士，授礼部主事，历官云南按察副使，迁甘肃行太仆卿。其子元忭，字子恭，号阳和。隆庆五年(1571)状元，授修撰，升翰林院侍读。元忭之子汝霖，字肃之，号雨若，又号矜园居士。万历二十三年(1595)进士，授清江令，调广昌，迁兵部主事，历任山东、贵州、广西副使、参议等职。汝霖之子耀芳，即张岱之父，字尔弢，号大涤。少工举子业，沉埋帖括中四十余年，屡试不中，后为山东鲁王长史。张岱曾作《家传》，叙其“高曾祖考”四代人甚详。

张氏家族在元忭一代最为荣显发达，其人品、学问、地

望皆足垂范后世。嘉靖三十四年(1555)，元忭十七岁，惊悉弹劾奸相严嵩“五奸”“十罪”的杨继盛，被处决西市的消息，不胜悲愤，公然设位作文哭祭之，闻者为之吐舌。其父天复尝为忌者中伤，元忭为白父冤，往返于云南、北京之间，奔驰数万里，忧愁劳顿，鬓发为白。及登显宦，曾家居数年，决不以私事拜托当地官府，“然事关公义，则侃侃无少避”(李贽《续藏书》卷二十二)。因此口碑甚美。其弟子曾凤仪云：“先生孝友在乡党，端节在乡间，直节在朝廷，令闻在天下，无不可为后学法程。”(《不二斋文选·阳和先生论学书后序》)朱赓云：“性刚介，不苟取予，亦不能媿媚事人。”(《朱文毅公集·阳和张公行状》)张岱颂扬曾祖父说：“吾文恭一生以忠孝为事。”张岱之父张耀芳也急公好义，在山东曾经代理嘉祥县的公事，为了解救前任县令赵某妻子儿女的困厄，慷慨解囊，代偿所欠库银一千八百两。邑人感佩，为立捐金碑。又平反冤狱多起，尝言：“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！”(《琅嬛文集·家传》)先辈忠孝仁义、刚介正直的道德品质，对张岱影响很大。

张氏这几代人都是学者，有治史的传统。张天复著有《湖广通志》、《广舆图考》，张元忭著有《皇明大政记》、《天门志略》、《馆阁漫录》、《读史肤评》。父子相继修撰《绍兴府志》、《会稽县志》、《山阴县志》，时人譬之司马谈、司马迁父子。他们也确有修撰明史的抱负，自身未能完成，而把这个巨大工程托付给后世子孙。张岱也有气魄担负起这个重任，决心步武伟大史学家司马迁和班固的足迹，继承先人的遗志，充分利用家中丰富的藏书^⑥，修撰一部明史巨著。他说：“余家自太仆公以下，留心三世，聚书极多。余小子苟不稍事纂述，

则茂先家藏三十余乘，亦且荡为冷烟，鞠为茂草矣。”(《琅嬛文集·石匱书自序》)又说：“自幸吾先太史有志，思附谈、迁，遂使余小子，欲追彪、固。”(《琅嬛文集·征修明史檄》)“太仆公”指张天复，“太史”指张元忬。张岱把修史作为自己毕生最大的使命，深受家庭的影响，也与时代风气有关。明清之际的大学问家如王夫之、黄宗羲、顾炎武等，莫不究心史学。又特重明史，如查继佐的《罪惟录》、谈迁的《国榷》，就是两部宏大的明史著作。易代之际，兵燹之余，史籍图书大量散失，遗老逸民，缅怀故国，欲求前朝旧事，要寻治乱兴亡之由，于是私家修史的风气便盛行起来。张元忬还是隆、万时期著名的理学家，推尊阳明心学，笃信良知之说，又惩王学末流空谈性命、不务实学之弊，而强调践履躬行。尝云：“知善知恶是良知，为善去恶是格物，此致良知宗旨也。”(《朱文毅公集·阳和张公行状》)又云：“当今所急，在务实不在务名，在躬行不在议论，愈笃实愈光辉，愈简易愈广大。”(《国朝名公尺牍类选·复许敬庵》)张元忬的思想是值得注意的，显示了王学发生转变的迹象，并开了清初致用学派的先河。良知与实学并重，也是张岱思想的一个特点。

张氏四代，皆能诗善文，有很高的艺术素养。张天复有《鸣玉堂稿》。元忬有《不二斋文选》，李贽谓其文“春容尔雅，粹然一出于正。”(《续藏书·理学名臣》)屠隆也称赞道：“文章巨公，片语南金，四海共宝。”(《白榆集·与张阳和太史》)张汝霖有《价园文集》，又精音律，通戏曲，居家常以丝竹自娱。张耀芳也“善歌诗，声出金石”(《家传》)。自张岱祖父张汝霖开始，三代人皆好戏剧声伎，有“可餐班”、“武林班”、“梯仙班”、“吴郡班”、“茂苑班”、“苏小小班”诸名目，“主人解事

日精一日，而僮仆技艺亦愈出愈奇”(《陶庵梦忆·张氏声伎》)。张氏又雅爱园林艺术。祁彪佳《越中园亭记》云：“越中国园亭开创，自张内山先生始。”“内山”即张岱高祖张天复，自他以后，陆续皆有营建。在绍兴，有砿园、天镜园、表胜庵、不二斋、众香国、猷花阁、悬杪亭、筠芝亭、镜波馆、苍霞谷、万玉山房、南华山房诸园，其中天镜园被祁彪佳推为越中诸园之冠。在杭州西湖，有寄园。张家还收藏了不少名人字画和古玩珍奇，有一块叫“木犹龙”的奇石，价值千金，相传是明代开国功臣常遇春得之辽海，后来流到市场上，张岱父亲拿十七只犀觥易此奇石，传为世宝。张岱叔父张联芳，字尔葆，是江南一大收藏家，与嘉兴项元汴齐名。又精绘画，与董其昌、李流芳等并称于时。其婿即著名画家陈洪绶，自幼从其习画，得其衣钵，洪绶是张岱好友。张氏几代人游于文坛艺苑，结识了许多名流俊士。张元忭曾救同乡徐渭出狱，与汤显祖、屠隆等也有交谊。张汝霖的文友也很多，象陈继儒、黄汝亨、王思任等皆为一时名宿。张岱叔父张烨芳去逝之日，文坛名流纷纷上门吊唁，“留诗去者，则郑孔肩、吴伯霖、严印持、黄元辰、李长蘅、陈明卿、文一起、陈古白、缪当时、方孟旋、艾千子、陈大士、罗文止、丘毛伯、章大力、韩仲求、宋比玉、萧伯玉、万茂先”(《琅嬛文集·附传》)。张岱可能目睹这一隆盛的场面，会过其中一些大名鼎鼎的文学家、艺术家。在这样一种充满文艺氛围的家庭环境中，自然容易孕育出多才多艺的文学家。

在张岱祖辈友人中间，徐渭对他的影响最大。徐渭生活在明代中叶和末叶之交，是晚明新文学的先驱者之一。他性格狂放，不拘礼法，诗文书画皆超逸有致，富有创新精神，

但“不得志于时，抱愤而卒”（袁宏道《徐文长传》）。晚明文学家无不服膺徐渭，袁宏道甚至以为“有明第一”。张岱的曾祖和祖父跟徐渭有深切的交谊，“雅与文长游好”（王思任《徐文长先生佚稿序》）。张岱从小就从祖父、父亲及乡人那里听到许多关于徐渭的遗闻佚事，使他对这位先人的好友、绍兴的奇人非常敬佩。他年轻的时候，就留心搜集徐渭的散失了稿件，二十八岁辑成《徐文长佚稿》，乞祖父张汝霖和父执王思任为序。他早期的诗也着意模仿徐渭，曾云：“余少喜文长，遂学文长诗。”（《琅嬛诗集自序》）而且学得很象，其友甚至以为他是“文长后身”。当然张岱是个性格“倔强”的文学家，不会长久寄人篱下，他的诗后来脱出了文长，形成了自己的风格。但在思想和创作上仍然留有徐渭的印记。

二 补天美梦

张氏家族传到张岱父亲张耀芳这一代，渐渐露出衰飒的气象。耀芳自小就刻苦钻研八股，“沉埋帖括四十余年”（《琅嬛文集·家传》），视力极差，戴上西洋眼镜，依然乐此不疲，一心想走上一代人科举仕宦之途。但是“屡困场屋”，年过半百，也未能登科。他又不善料理家务，用钱如水，及至暮年，“身无长物”。虽说家底还厚，但已大大不如从前了。张氏便把重振家风、光耀门庭的希望寄托在张岱这个嫡长子身上。

张岱幼年，聪敏颖异，早露文学才华，深得家人的宠爱和瞩望，祖父张汝霖经常携带他出去拜访文友诗侣。请看他童年的三件佚事：

陶庵六岁，舅氏陶虎溪指壁上画曰⑤：“画里仙桃摘不下。”陶庵曰：“笔中花朵梦将来。”虎溪曰：“是子为今之江淹。”（《快园道古·夙慧部》）

季祖面麻奇丑⑦，眼眶痛肿，痘瘡层沓，短小戟张，见者大笑。陶庵七八岁时，廷尉喜置之膝上，将其髭。廷尉曰：“儿善属对，为我作须对。”陶庵曰：“大人，美目深藏，桃核缝中嵌芥子；劲髭直出，羊肚石上种菖蒲。”廷尉大笑称赏。（《瑄朗乞巧录》）

六岁时（《快园道古》、《瑄朗乞巧录》作八岁），大父雨若翁携余至武林，遇眉公先生（陈继儒），跨一角鹿，为钱塘游客。对大父曰：“闻文孙善属对，吾面试之。”指屏上《李白骑鲸图》曰：“太白骑鲸，采石江边捞夜月。”余应曰：“眉公跨鹿，钱塘县里打秋风。”眉公大笑，起跃曰：“那得灵隽若此，吾小友也。”欲进余以千秋之业。（《琅嬛文集》卷五）

家长和亲友们对这样一个绝顶聪敏的孩子，寄予极大的希望，勉励他不断上进，将来能建“千秋之业”。张岱那时对此厚望未必能领悟，随着年岁的增长，建功立业观念由蒙眬恍惚的状态逐渐清晰起来。十六岁写的一篇骈文《祁梦疏》，表露了他对人生一些大问题的思考。摘录如下：

某也蹉跎偃蹇，轩翥樊笼，顾影自怜，将谁以告？为人所玩，吾何以堪！一鸣惊人，赤壁鹤耶？局促辕下，南柯蚁耶？得时则驾，渭水熊耶？半榻蓬除，漆园蝶耶？神其诏我，或寝或叱？我得先知，何从何去？择此一阳之始，以祈六梦之正。功名志急，欲搔首而问天；祈祷心坚，故举头以抢地。（《陶

庵梦忆·南镇祈梦》)

这篇少年杰作，通过祁神问梦的方式，表现了一个生长繁华而有志的纨绔子的内心困扰，对自由、理想的热烈追求。他不愿燕燕居息于安乐窝中，就象穴处在大树底下的蚂蚁，象梦中翩翩飞舞的蝴蝶。他要跳出“偃蹇”，飞出“樊笼”，如鸿鹄之展翅高举，飞则冲天，鸣则惊人。盼望遇上大好的时机，象历史上风云际会的英雄人物，一展宏图，建立不朽的功勋。“渭水熊”可能指西周功臣姜尚，他曾钓于渭水之滨，得遇文王，载与俱归，后辅武王灭商。“功名志急”是这篇疏文的中心思想。

当时明代统治江河日下的形势，使张岱愈益认识到有一种历史使命感。明代万历中期，由于张居正厉行改革，变法图强，曾一度出现振兴的气象。但到万历后期，全盘否定改革，社会危机日益加深，各种积弊灾祸同时迸发。朝廷频年用兵，不断增加赋税，“民力殫残”，以万历为首统治阶级犹且贪得无厌，纵欲挥霍。又长期不理朝政，一切委诸宦官，矿使税使，四出虐民，“帝率庇不问”，且“以为能”(《明史·食货志》)。天启年间，政治大坏，宦官魏忠贤专权，大肆杀戮正直大臣，明朝元气大伤，一蹶不振。张岱在《石匱书·熹宗本纪》中评道：“天启则病在命门，精力既竭，疽发骨，旋痈溃毒流，命与俱尽矣。”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已经察觉到这一衰亡的征象，预感到可能要发生“天崩地坼”的大灾难。也有些满腔热血的志士，希望献身报国，以期救亡图存。张岱也是这样一个青年，他曾明确说过：“张子志在补天。”(《琅嬛文集·越山五佚记》)

如何实现“补天”之志？封建的取士制度决定着一切胸怀

远大政治抱负的人，不得不走科举的道路。张岱也不例外。早年也好习“举业”，《砚云甲编·陶庵梦忆序》说他“少工帖括”。但是运气不佳，也和他父亲一样，被淘汰了。这是张岱生平遭到第一次沉重的打击，感到郁愤不平。他梦想炼石补天，但被当权者无情地抛弃了，“满腹才华，满腹学问，满腹书史，皆无所用之”。痛切感到科举制度的腐朽、危害，它摧残扼杀人才，严重贻误国家大事。张岱批判说：“有人于此，一习八股，则心不得不细，气不得不卑，眼界不得不小，意味不得不酸，形状不得不寒，肚肠不得不腐。”又说：“举子应试，原无大抱负，止以咕哔之学迎合主司。即有大经济、大学问之人，每科之中不无一二，而其余入彀之辈，非日暮途穷、奄奄待尽之辈，则书生文弱、少不更事之人，以之济世利民，安邦定国，则亦奚赖焉？”他一针见血指出明代统治者以八股取士的目的，“盖用以镂刻学究之肝肠，亦用以消磨豪杰之志气者也”。明朝统治者实行八股取士制度，坑害了无数的知识分子，到头来自己也受到了惩罚，“则高皇帝之误人尤小，其所以自误则甚大矣，嗟嗟！八股一日不废，则天下一日犹不得太平也！”（《石匱书·科目志》）张岱对八股制艺、科举制度的批判非常尖锐深刻。张岱在科场的失利，也使他进一步认识到明代后期腐朽制度是压抑埋没人才的罪恶根源，“余因想世间珍异之物，为庸人所埋没者，不可胜记”（《琅嬛文集·越山五佚记》），对那些穷愁潦倒的“寒士”寄予深切的同情，给他们树碑立传，借此倾吐胸中“抑郁牢骚”、“磊砢不平之气”。他对黑暗现实的对抗情绪加深了，年轻时编过一个叫《乔坐衙》的杂剧，就是揭露、讽刺官场的黑暗和丑恶的。

张氏父子都曾为获取科举功名奋力拼搏。张岱父亲屡次